

25-05

革命烈士和党史人物传略

第五集



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

革命烈士和党史人物传略

第五集

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九〇年八月四日

目 录

安子文	宋存戈 李茂盛	赵 晶 (1)
李鼎铭	李敬谋	熊宇良 (30)
李力果	中共米脂县委党史办公室	艾绍元 (35)
杨文谟	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	赵正安 (45)
李含惠	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	赵正安 (51)
李秉章	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	赵正安 (54)
史仙舟	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	史明智 (59)
唐洪澄	中共清涧县委党史办公室	刘光明 (63)
李炳雄	中共清涧县委党史办公室	刘光明 (70)
霍如海		张塞外 (72)
高长久	中共佳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张 峰 (77)
杜嗣尧	中共佳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崔仲芳 (82)
曹又参		曹国权 (87)
白进凯	中共横山县委党史办公室	刘继国 (96)
王子文	绥德县民政局	王树才 (98)
庞国兴	王智华	傅文浩 (106)
张毓华		何 鸣 (115)
师勇军	中共榆林市委党史办公室	(124)

安子文

宋荐戈 李茂盛 赵晶

安子文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活动家。他自幼投身革命，直到“老骥伏枥”，仍以“志在千里”的气魄为党忘我地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

(一)

安子文，原名安志瀚，字浩然，一九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现子洲县城）。

安子文的父亲安庆云是前清秀才，民国年间曾任陕西省议员，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安子文童年时，家有耕地二十九垧（每垧合二亩半），还经营了一个杂货铺。他十二岁时父亲病故，家业无人经营，杂货铺很快倒闭，耕地逐年变卖，到后来几乎全靠借贷度日。

安子文七岁进入村塾读书，第二年转入绥德县城初级小学就读。一九二一年春，他又和大弟安志铭一起，来到绥德以北的米脂县，借住于外祖母家中，在县城的高级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绥德师范。一九二四年，共产党员李子洲出任该校校长。他聘请杨明轩、王懋廷、田伯英三人分任教导

主任、国文教员和英文教员，校内革命空气愈来愈浓。在这些老师的教育、指引下，安子文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向导》等书刊，思想觉悟大有提高，很快加入了革命团体“共进社”。是年冬从绥德师范毕业后，年仅十五岁的安子文告别故乡来到北京，去河南报考由共产党员刘天章担任队长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学兵队。因年龄太小，未被录取，遂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中，安子文受共产党员王敬臣的指派上街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事后，他被勒令退学，只得重返北京。住在吉安所左巷六号“共进社”机关内。六月七日，经蔡振德、王懋廷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这时，他考进了京兆高中，一面读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安子文参加了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的示威游行。当两千多人的游行队伍行至东城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请愿时，临时执政段祺瑞竟然命令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安子文由于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也被打伤。京兆高中得知他参加了“三·一八”示威游行的活动后，开除了他的学籍。此后，党组织派他到共青团北京地委工作。

安子文在北京团地委主要是从事交通联络工作。他骑辆自行车，顶烈日，冒风雨，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地传送党内和团内的机密文件和革命传单。有一次，他带着一些重要文件和传单走到什刹海附近，被敌人便衣盯梢，敌便衣侦探也骑着自行车在他身后紧追不放。他急中生智，把自行车骑得

飞快，等敌人追上来时，他猛一刹车装成摔倒的样子。敌探也慌忙刹车，摔倒在地。安子文却趁敌人爬在地上起不来时，直起身把车一蹬，拐进了小胡同，巧妙地甩掉了敌人。

一九二六年九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查封了“共进社”机关，安子文也被抓了起来。十月安子文被取保释放，组织上为了防止意外，决定让他离开北京。

一九二七年一月，安子文回到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担任发行工作；后来，中共陕西省委又把他派到冯玉祥部队第三路军第十九师担任政治处副处长。十九师师长吉鸿昌是一位开明军人。安子文到任后，经常和吉鸿昌在一起，向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革命思想启迪吉鸿昌和部队官兵的阶级觉悟。在安子文等人的帮助下，吉鸿昌对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逐渐有了认识，他所领导的十九师，成了冯玉祥部队中的一支劲旅。一九二七年五月，冯玉祥率部从陕西出发东征河南，十九师担任前锋，边打边走，所向皆捷。同年六月，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公开同蒋、汪合流反共。冯玉祥提出要“礼送共产党出境”。一天深夜，吉鸿昌获悉有人来抓安子文的消息，赶忙跑去送信，并赠送银洋二百元作为路费，劝安子文快走。安子文立刻离开了第三路军，但未能走脱，被抓回送进了冯玉祥在开封专为共产党人办的“训练班”。由于吉鸿昌从中说情，安子文被放出“训练班”，又留在第三路军政治部工作。这时，党在第三路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都被“礼送出境”，党组织通过宣侠父，委托安子文担任了第三路军中党的领导工作。不久，他又被冯玉祥的军法处逮捕关押，获释后便离开了冯玉祥部队。

(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安子文到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了他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情况，河南省委正式决定安子文由团转党，并分配他担任省委交通科长。

一九二八年三月，由于叛徒告密，党的开封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市委的许多领导人被捕。安子文因住在市委机关的附近，也被株连逮捕。他们先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审讯，后来案子移交河南省高等法院，安子文等被投入开封第一监狱。

安子文是作为嫌疑犯被逮捕的。他在狱中用的是假名字，编的是假口供。加之他到开封工作的时间不长，很多人包括叛徒在内都不认识他。因此敌人只判了他十一个月的徒刑，而且在狱中也自由一些。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安子文主动担负起狱中“交通”的任务。监狱中一些共产党员创办的《狱灯》、《镣声》两种手写在小纸头上的“刊物”，就是经过他的巧妙传递，得以在各监号的共产党员中间秘密传阅。

几个月后，党的河南省委机关也被破坏，省委书记周以栗和宣传部长任作民在被逮捕后审讯时，被敌人用烙铁烙得皮开肉绽，伤势很重，连吃饭拉屎都不能自理。为了照料这两位党的负责干部，安子文设法和他们住到一起，担负起了护理和与狱外党组织联络的任务。任作民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病逝的。他曾在日记里写到过有一位小同志如何精心护理他和周以栗。但是直到临终，他还不知道那位小同志就是安子文。

不久，开封第一监狱因为犯人急速增加，另外又开辟了一个分院，安子文被送进分院关押。后来，由于狱外党组织的营救，也由于蒋冯大战中韩复絮倒戈，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子文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释放出狱。

安子文出狱后，一九二九年秋天，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担任了党中央的交通，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为党传递文件，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他曾于一九三〇年春护送任弼时夫妇到汉口；一九三〇年四月护送周逸群、段德昌等从洪湖苏区回上海党中央机关；还亲自去洪湖苏区送过阻截敌人军火的情报。

一九三〇年八月，安子文按照党中央指示到了天津，北方局书记贺昌留他在北方局担任交通科长。安子文做这项工作，已有一套丰富的经验。例如，交通人员的服装要多样化；交友要广泛化；要熟悉和适应各地的风俗习惯；要住在普通群众杂居的地区，以便隐蔽等等。北方局交通科按照安子文提出的这些原则和办法行事，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

一九三〇年十月，北方局经过反复查证核实，掌握了原天津河北区委负责人李纯已经叛变投敌的确凿证据。这时，李纯表面上仍然伪装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被敌人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的侦缉队副队长，成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党组织的最大威胁。为了铲除这个祸害，贺昌决定由安子文负责惩处叛徒。安子文受命后，和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领导党的地下武装人员，在万国桥（现称胜利桥）的桥头将李纯干掉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安子文担任顺直省委的秘书长。不久，党中央调他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这时，叛徒张开运来

天津担任了国民党警察局的侦缉队长。顺直省委要求安子文在离开天津前负责完成这项除奸任务。

但是，敌人于三月的一天先下手了。那天，安子文带着一个同志到顺直省委在法租界设立的一个以“垦野公司”作招牌的机关里去处理公事。那知这个机关已被敌人发现，安子文一进门就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关进了天津监狱。

一九三一年六月，安子文和周仲英等政治犯从天津押送北平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冬季又转送到草岚子监狱。草岚子监狱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反省政策”。为了对付敌人这种“感化”、“诱降”的恶毒手段，领导狱中的共产党员坚持斗争，狱中建立了党支部，安子文担任支部委员。

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安子文等发动全体政治犯进行了一次争自由的斗争。结果使刑重者被酌情减刑，有十多个判了刑的犯人被释放出狱；并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玩弄“大赦令”的骗局。其后，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开展了革命气节教育，提出了“红旗出狱”的口号，还把“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警句作为狱中共产党员的座右铭，要求党员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针对监狱当局在推行“反省政策”时采取的所谓请法官讲课、请牧师说教布道和强迫政治犯写“反省”文章等措施，狱中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了巧妙而有效的抵制。以后，狱中党支部还多次发动改善生活和反对虐待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为了更好地开展狱中斗争，狱中党支部迫切需要和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寻找联络人这个问题上，安子文边观

察边想办法。他发现多数看守都是当差混饭吃的。其中有个山东口音的看守班长，平时沉默不语，有正义感。通过进一步的接触，安子文知道了他叫牛保正，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表示钦佩。安子文把这个情况向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作了汇报。经过慎重研究，党支部确定安子文和薄一波等同牛保正交朋友。此后，他们一面在生活上关心牛保正，一面启发牛保正提高阶级觉悟和确立爱国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争取，牛保正真的觉悟了。他利用自己身上那张“虎皮”，替狱中党支部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三三年冬，何应钦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军法处，接管了草岚子监狱。反动派为了逼迫草岚子监狱中的政治犯自首投降，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定期“审查”，规定凡反省自首者，履行出狱手续；登了“反共”启事的，就释放出狱；面三次“审查”还不反省的就枪毙。面对这种形势，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一大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毫不畏惧。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抗日有理，无过可悔。”使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经过狱中党支部研究，决定进行一次绝食斗争以粉碎敌人对政治犯施加的种种压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子文和薄一波、殷鉴、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多个政治犯开始绝食。他们用顽强的革命意志绝食七天，迫使敌人答应了改善伙食，允许订报、买书，每天放风三次（每次一小时）的条件。“定期审查”的失败和政治犯绝食斗争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气恼。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反动当局派宪兵三团进驻监狱，并指使两名特务冒充“政治犯”，用“苦肉计”来侦察狱中党组织的活动情况。由于看守班长牛保正已把情况告诉了薄一波和安子

文，狱中党支部和共产党员先是对特务严加戒备，后来又找了一个借口，把其中一个叫小吴的特务狠狠地揍了一顿轰出去了。但是，狱中党支部的一些活动还是被宪兵三团发现了。于是，主管监狱的宪兵三团团副向南京呈报，把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锡五、胡锡奎、张玺、董天知、张振胜、韩钧、张友清、杨献珍等十二个同志判处死刑。

在这最后的时刻，敌人还是妄图借助于死亡的威胁迫使安子文等人屈服。但安子文等泰然自若，他们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当敌人最后提审时问安子文：“你不怕死吗？”安子文回答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现在死了，你们以后不是也要死吗？”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安子文果断地回答：“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杀了我们，以后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多少。”

华北事变后，日寇攫取了我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宪兵三团离开了北平，安子文等十二人才幸免遭难。

一九三六年春，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鉴于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向中央请示，准备让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五、六十名党的重要干部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党中央书记处经过讨论，由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请示报告，并指示北平党组织贯彻执行。同年秋，安子文和殷鉴、薄一波、刘澜涛等五十二位同志按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分九批相继出狱。他们出狱后立即与党组织接上关

系，走上北方局指定的工作岗位，投入了火热的斗争^①。

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安子文出狱后以北平五十三中学教师为掩护职业，担任北平市委的组织部长。为了适应在新形势下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列宁关于批判“左”倾幼稚病的著作和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学习党中央和北方局下达的各项指示和文件，对于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把学习和总结以往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联系起来，逐步认识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只能把中国革命引上失败的道路；只有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能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于是，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和市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西安事变”之后，安子文接替黄敬兼管领导北平学委的工作。这期间，他和学委书记蒋南翔等一起，经常研究学联的工作；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短短的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学生运动骨干中吸收了二三百名党员。同时，他们还组织学生对宋哲元、何基沣以及国民党二十九军官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使他们采取了抗日的立场。

安子文出狱后一直在废寝忘食地工作。有一次他得了霍乱病，休克在过道上，幸亏及时请来医生救治，才转危为安。病好后过了三天，就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四月，经孔祥瑛介绍，他和山西籍著名民主战士刘少白（抗

^①在“六十一人”案中除五十二位共产党员外，其余九人情况不同，不属于这一范围。

战开始后经王若飞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秘密党员）的次女刘竞雄结婚。刘竞雄当时就担负起了掩护地下党工作的任务。

（三）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敌手。这时，作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安子文，首先让市委机关和其他单位的同志撤退，然后自己才离开北平，到天津爬上一列货车，途经德州、济南、徐州，又折向郑州，石家庄，辗转到达太原，向刚由平、津地区迁到太原的中共北方局报到。北方局把安子文留在组织部工作，很快又派他和几个同志去临汾建立后方，以便一旦太原失守之后，把北方局搬到那里。安子文在临汾县刘封镇找到办公地点后，又解决了生活供应中的许多棘手问题，为北方局迁到临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还在太原失守前夕，曾经和安子文等一起坚持过狱中斗争的薄一波，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通过统战关系，担任了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保安司令，管辖沁县、沁源、安泽等十三县。不久，薄一波率领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到达沁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公署所在地），准备在太岳山区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

为了完成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刘少奇特地找安子文谈话，让他随同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到沁县协助薄一波开展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安子文和李成芳、刘竞雄等随同彭真从临汾出发，经过安泽、沁源到达沁县。根据工作需

要，彭真在沁县筹建起党的太岳区工作委员会以后，便于十二月底转赴晋察冀区，留下安子文担任太岳区工委书记，领导白（圭）晋（城）路以西，同蒲路以东，平遥、介休以南，曲（沃）高（平）公路以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从此，安子文就参加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活动。

太岳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政治环境是相当复杂的。当时，太岳区没有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薄一波率领的决死一纵队和驻扎该区的国民党军队相比，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装备方面都处于劣势；县、区、村政权还是阎锡山的旧班底，各种反动会道门都有一定的势力，加之日寇占领太原之后，在直取南同蒲路各县的同时，正准备进攻晋东南，以完成其对山西的占领。为了顺利地发展党的力量和开展党的活动，安子文将党的太岳工委挂上了八路军联络处的牌子。有了这个合法的名义，它既可以在上层和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政权搞统战工作；又可以在基层发动群众；还可以保护受迫害、受摧残的群众，向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的旧政权进行政治斗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一九三八年初，太岳工委正式归属中共晋冀豫省委领导，安子文任晋冀豫省委委员、统战部长，并继续兼任太岳工委书记。他根据晋冀豫省委二月会议精神，协助薄一波在太岳山区抓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为了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战动员”热潮，他们从牺盟会决死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组织民运工作队深入广大乡村，采取开会讲演、写标语、散传单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政治、减租减息等革命主张，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事业。经过一段工作，不仅为抗日军队筹集了充足

的粮款，而且随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农民参军，决死一纵队充实了原有团队，又组建了新的团队，加强了战斗力。与此同时，民运工作队还常常同那些残害人民，压制抗日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工作队在各地由下而上地建立了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使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组织上的依托。从此，太岳区“抗战动员”的热潮日趋高涨。这个时期，安子文还对阎锡山以及太岳区境内国民党驻军的高级将领冯钦哉、高桂滋、刘勘、武士敏等人进行了统战工作，力争团结尽量多的军队和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有一次，国民党一六九师挑起事端，把机关枪架到决死一纵队司令部门口，要“兵戎相见”。安子文闻讯后立即协助薄一波和武士敏师长谈判，晓以团结抗日的大义。在安子文和薄一波那种诚挚坦率态度的感召下，武士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此后，他一直和太岳军民并肩战斗，最后牺牲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

一九三八年三月，朱德、彭德怀、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经安泽、屯留，进驻沁县。安子文经常向他们请示和汇报工作，协助薄一波进行统战工作和通过实行合理负担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为此，他和薄一波利用日寇准备进攻晋东南地区、阎锡山的旧政权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有利时机，及时派遣共产党员去各地担任抗日的县长和区长。当时，有些共产党员认为县长、区长是反动政权的象征，他们宁愿到前线战死沙场，也不愿到地方上去当“官”。针对这种认识，安子文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反复说明掌握政权的重要性，使这些同志愉快地背起背包上任。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军集中了三万多兵力，向太岳和太行发动了第一次“九路围攻”。安子文和薄一波按照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通过党政军系统和群众救国团体进行了反围攻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由于地方上做了充分的支前准备工作，八路军、决死队和部分爱国的国民党军队经过二十多天的奋战，歼敌四千多人，收复了晋东南的十八座县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一九三八年六月，安子文出席了中共晋冀豫省委在沁县古城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朱德、彭德怀的参加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天的讨论，通过了《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即“六月决定”），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党员与开展群众工作，开展游击战，把晋冀豫边区建设成为坚强巩固的根据地。

按照“六月决定”，安子文在太岳区狠抓了党的建设。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时，太岳区已先后建立了沁县、沁源、长子、屯留、平遥五个县委，还建立了安泽和介休两个县的领导机关，对浮山也建立了党的领导关系。全区建立了二百六十多个党支部，共有党员三千八百四十人。这时，太岳工委奉命改称太岳特委，安子文为特委书记。

一九三九年一月，太岳特委又改称太岳地委，安子文担任地委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太岳地委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和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安子文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使党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组织就应该在巩固中求发展，把巩固与教育、整顿和建设党的组织，当作今后的主要任务。他还强调，要不断巩固与扩

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活动分子会议之后，太岳区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使全区的党组织遵循党的正确路线，更加巩固和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本侵略者集中重兵，对太岳和太行根据地第二次“九路围攻”。这时候，太岳和太行区的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打到敌人的占领区，开展交通破击战；太岳各县在地委领导下，成立了战时指挥部，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他们利用境内七沟八岭的险要地势，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反“围攻”斗争，终于迫使敌人退出了根据地。但是，由于日军在第二次“九路围攻”中占据了白晋路沿线包括沁县县城在内的所有城镇，打通了白晋路，把太岳和太行割裂为二。安子文和薄一波率领太岳地委和决死一纵队领导机关由沁县转移到沁源。从此，沁源就成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投降逆流愈演愈烈，山西的局势更加紧张。当时，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之后大造反共舆论，采取反共措施，妄图把山西新军和牺盟会消灭掉。安子文除了协助薄一波的工作之外，还于十一月间主持召开了太岳地区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广泛持久的反投降运动”坚决反对和彻底粉碎反共投降逆流。会后，太岳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举行各种集会，谴责、声讨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共投降活动。同时还广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清除了包括决死一纵队纵队长梁述哉在内的阎锡山的旧军官，积极进行除奸活动。由于安子文和薄一波领导太岳军民做了以上防变的准备工作，所以阎锡山